

余英时作品系列

朱熹的历史世界

下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余英时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余英时作品系列

余英时著

朱熹的历史世界 下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善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質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儀

咸淳臨安圖

餘杭縣

龍泉寺 天廟

柳史橋 印差橋 吳漢

通吉 天目山

下橋



下篇分目录

下篇 专论 _____ 387

绪说 _____ 389

第八章 理学家与政治取向 _____ 400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_____ 400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_____ 409

三、“得君行道” _____ 423

——朱熹与陆九渊

四、“得君行道” _____ 445

——张栻与吕祖谦

五、余义 _____ 454

第九章 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 _____ 458

一、前言 _____ 458

二、陆九渊的被逐 _____ 463

三、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 _____ 473

四、王淮罢政的过程 _____ 483

五、周必大与理学家 _____ 497

第十章 孝宗与理学家 _____ 524

一、前言 _____ 524

- 二、孝宗晚年部署之一 —— 531
 - 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相
 - 附说一：朱熹“立朝四十日”辨 —— 552
 - 附说二：六和塔与浙江亭 —— 555
 - 附说三：灵芝寺与北关 —— 560
- 三、孝宗晚年部署之二 —— 576
 - 擢用理学型士大夫
- 四、理学集团的布局 —— 594
 - 荐士与重整台谏

第十一章 官僚集团的起源与传承 —— 623

- 一、前言 —— 623
- 二、起源：从陈贾“禁伪学”谈起 —— 627
- 三、官僚集团的传承 —— 635
- 四、光宗朝的官僚集团 —— 642
- 五、刘德秀的自叙 —— 649
- 六、姜特立 —— 657
 - 官僚集团与皇权
- 七、总结 —— 670

第十二章 皇权与皇极 —— 686

- 一、孝宗的三部曲 —— 687
 - “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
- 二、概说：史学与心理分析的交互为用 —— 699
- 三、从人官到受禅 —— 708
 - 孝宗的心路历程

下篇分目录

- 四、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 727
- 五、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向度 —— 745
- 六、“责善则离” —— 768
——孝宗与光宗的心理冲突
- 七、环绕“皇极”的争论 —— 808
- 八、代总结：三点观察 —— 845

附录： 朱熹挽孝宗诗笺释 —— 854

附论三篇 —— 865

- 附论一 “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 —— 867
——答刘述先先生
- 附论二 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 —— 878
——答杨儒宾先生
- 附论三 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 —— 912
——刘述先先生《回应》读后

陆九渊《与李省幹》第二书云：

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象山先生全集》卷二）

黄震（1213—1280）在《黄氏日抄》卷三三以下特立“读本朝诸儒理学书”之目（卷三三——四五）；此诸卷“理学”一词屡见不鲜，兹录其最明显的一则如下：

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卷三三“周子太极通书”条）

“理学”与“道学”所指无大异，此为确证。此时虽尚无人以“理学”与“心学”分指朱、陆，但“心学”之名也已出现。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成于淳祐壬子（十二年，1252），其卷六《文章性理》条自言曾辑有《心学经传》十卷，所引原序中有“学者不求之周、程、张、朱固不可”云云，则他所谓“心学”也可与“道学”、“理学”互通。若将这三个名称在南宋的用法加以比较，我认为朱熹、陆九渊、黄震所用过的“理学”一词最为客观，也最少争议。不但如此，由于约定俗成，“理学”在今天早已成为通行最广的观念，读者自能心知其意。本书非辨析名相之作，姑止于此。

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观点研究宋代理学的人往往不涉及理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理学内部的理论构造方面。其史学的特色则在追溯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因此理学怎样上接孔、孟，中越汉儒，近承韩愈、李翱，旁涉佛、老等问题在哲学史研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若仅从取径方面说，现代研究仍然与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因为从前儒者论述“道统”的形成与传衍也着眼于“义理”的内在

发展。这一研究方式在哲学史或思想史领域内本属于主流的地位，其正当性是不必置疑的。但以此方法施之于理学的研究却造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即理学与理学家与当时实际政治的关系仅在若有若无之间。这一点又和常识中所理解的理学的性质有关。传统儒家认定理学家所讲求的是万古不变的“内圣之学”，现代哲学史家也断定理学所处理的主要是不在时空之内的种种形而上学的问题。既然如此，理学家之说自有其内在理路可循，他们与政治的牵涉无论深浅如何，都不致对理学的建构和演进发生任何实质的影响。所以在一般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论著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理学家的政治活动。

但本书的主题是宋代政治文化，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自然构成了研究的重心。下篇深入探讨理学家的政治活动更是题中必有之义。理学虽起于北宋，但熙宁、元祐之间，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无大影响。就政治而言，熙宁变法之初，程颢仅以个人身份参加过短时期的工作。元祐时，朝廷有所谓洛、川、朔三党；洛党以程颢为领袖，羽翼则朱光庭、贾易二人。（见《邵氏闻见录》卷一三）其中贾易且与理学毫无渊源，不过因反对苏轼之故，一度助颢攻川党而已。（见《宋史》卷三五五本传）朱光庭则初师孙复与胡瑗，后来才从游二程于洛阳。（见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三《朱公墓志铭》）；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为程颢“门人”。（见《宋史》卷三四六《吕陶传》引陶语；《宋史》卷三三三本传则未言其从学二程事）但进入南宋之后，主要由于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诸人的倡导，理学才取得了儒学主流的地位。所以在朱熹时代，理学家人数之多和政治活动的频繁与复杂都远非北宋所能相提并论。下篇的研究大体不出这一范围。哲学史、思想史对此可以置之不论，但却是政治文化史的中心课题。

最后，下篇所谓“专论”之“专”，还必须作进一层的说明。

第八、第九两章所讨论的是理学、理学家与南宋政治文化的一般关系，但最后三章则构成一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所处理的是南宋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环节，已湮没了八百年之久。这一遗失的环节不但贯穿了孝、光、宁三朝的政潮与党争（起淳熙十五年，1188，迄庆元六年，1200），而且也牵系了理学家种种集体的与个别的政治行动。我在第七章的撰写过程中初步发现了这一环节；为了要尽可能恢复这一环节的历史原貌，我才不得不遍考文献，重新建构一切与之相关的人与事。所以下篇事实上是现代史学中所谓“专题研究”（“monograph”），与上篇的性质截然异趣；我在这一部分所投注的时间与精力也超出上篇远甚。至少就我个人的主观愿望说，下篇承担了两重任务：第一，通过史事建构以补足南宋政治史中久阙之一章；第二，通过理学家们的政治活动以彰显南宋儒学的政治取向。详细的论证见以下各章，这里先略作提要，以供读者参考。

高宗死在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其时孝宗年已六十有一，再过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他便禅位于光宗了。但在这最后一年又三个月之内，他却在积极构想和部署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革新，以实现他毕生关于“恢复”的向往。在这一构想与部署中，他很自然地 and 当时理学派士大夫结成了联盟。淳熙十四年底叶适《上殿劄子》论变更“国是”，十五年六月除朱熹兵部郎官以及熹十一月上《戊申封事》都是最明显的信号。

就理学派士大夫一方面说，他们大体上继承了北宋秩序重建的儒家理想，不过在南宋的历史情况下，这个理想也修改为修明内政以图“恢复”，和孝宗晚年的想法基本一致，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得君行道”的范例在他们心中仍时时激起一种憧憬的情绪，使他们不知不觉中对孝宗抱有神宗第二的期待。不仅陆九渊淳熙

十一年至十三年“轮对”活动和十五年正月所撰《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象山集》卷一九）表现了这种意识，朱熹平时对安石与神宗的“千载一遇”更是称羨至再至三，绍熙三年（1192）他《跋王荆公进邲侯遗事奏藁》仍说：

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文集》卷八三）

他笔下写的是神宗，心中想到的则未尝不是孝宗。叶贺孙记他在绍熙二年以后的话云：

寿皇直是有志于天下，要用人。（《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孝宗朝》）

这和上引《跋》语出于同时，可见他心中确以孝宗与神宗同为“有志”之君。但最显豁而又最有力的证据则是下面这一段话：

只缘自来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护。其弊至于今日略欲触动一事，则议者纷然以为坏祖宗法。故神宗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伤于太锐，少商量。（《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

此条是沈侗记戊午（庆元四年，1198）以后所闻，代表了朱熹晚年的最后议论。他在这里明明以神宗与孝宗相提并论，肯定两人同是锐志改革的皇帝。神宗的改革即熙宁变法，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孝宗的改革何所指呢？这当然只能指他在退位前一年多的政治部署了。所以朱熹也称此一阶段为“孝宗末年之政”（《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

孝宗朝》)，而叶适则将这段时期概括为“淳熙末年，求治愈新”八个字（《水心文集》卷二四《施公墓志铭》）。根据朱、叶等参与其事者的证词，孝宗末年曾实际有过一次改革朝政的举动，是无可怀疑的客观事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详见后文），这次改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便已胎死腹中，所以它在历史上未能留下像熙宁变法那样的正式名目，而终于变成了一个“遗失的环节”。

孝宗末年的改革部署始于人事的大更动，他大量引进理学家士大夫以取代王淮长期执政所形成的官僚集团成员。另一方面，理学家既视他为神宗第二，自然也不肯轻易放过这个“得君行道”的机会。朱熹在淳熙十五年五月王淮罢相之后，力疾入奏，并毅然接受兵部郎官的任命（见《辞免江西提刑状二》，《文集》卷二二），这和他平时坚辞除命的作风，颇有不同，则理学阵营的振奋之情，可见一斑。孝宗的部署活动虽集中在淳熙十六年二月退位前的一年多时间之内，但部署并未随退位而中止。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光宗一朝的三位主要执政大臣——周必大、留正、赵汝愚——都是他一手选定的。周、留两人除命左、右相在淳熙十六年正月己亥，下距二月壬戌内禅不过二十四日。他亟召赵汝愚入都也在内禅的前夕，绍熙四年三月汝愚除同知枢密院事则是在幕后一手促成的（详见第十章）。他选择宰辅显然根据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其人必能执行他的改革构想；第二，其人必能与理学家士大夫合作。周、留、赵三人无一不具备此双重资格。非常明显的，他寄望于光宗子继父志，逐步推展他所开始的改革运动。

但是权力世界很难有容纳“一厢情愿”的空间，即使是掌握了权源的皇帝也不例外。孝宗末年的改革部署从一开始便激起了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的尖锐冲突。这两个士大夫政治壁垒的对峙最迟也可以上溯至王淮执政的初期，淳熙九年（1182）朱熹劾唐仲友便是一个最显著

的标志，详见上篇第七章。所不同者，王淮执政时代，政权操于官僚集团之手，他们采取种种策略向理学集团的进攻作反戈之击；淳熙十五年，孝宗“乾坤归独御”，自出心裁，转而与理学家士大夫结成联盟，由周必大取代了王淮的相位，官僚集团失去了皇权的支持，于是从防守转入进攻阶段。这一攻守易势的变化是非常微妙而又是极其重要的。一切证据都指向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淳熙十五年五月王淮罢相之后，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立即转而包围已指定为“参决庶务”的太子（即后来的光宗），并以此为基地向周必大的执政集团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兹举二例以证之。淳熙十五年七月，叶適等五人曾面呈《荐士书》与右相周必大、参知政事留正、萧燧，推荐了三十余位理学家士大夫，希望执政大臣加以擢用。这件事很快便为官僚集团的首领之一葛邲所侦知，他是王淮所赏识的人，此时正任东宫詹事，代太子（光宗）发言（见周必大《思陵录上》，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庚子条，《文忠集》卷一七二）。他既探得此事，便广为传播，激起了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意在攻必大去位，使理学集团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详见第十章第四节）。此一例也。同年“王党”的另一重要成员陈贾，虽丁忧在籍，却唆使他的内侄何澹利用周必大与留正之间的矛盾，极尽挑拨之能事。其结果则是留正在孝宗面前，处处与必大为难，使后者不能安于相位。何澹也走的是太子路线，早已和光宗的“近幸”姜特立、譙熙载暗通款曲了（详见第十一章）。此又一例也。这两例都已在周必大与孝宗的往来密档中获得证实，所以上面所说孝宗的改革部署直接激成两大政治集团的冲突，并不是一种推测或假说，而是已经成立了的历史事实。终光宗一朝（1189—1194）这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直到宁宗庆元元年（1195）以赵汝愚为首的理学集团彻底失败才告结束，孝宗的改革部署也随之而扫地以尽。其间演变的复杂与曲折，

则非数语所能概括，详见以下各章。

孝宗的改革部署为什么必须迟到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后才发动？从整体部署的过程看，他在“末年”所推动的改革显现出破釜沉舟的决心，以致连朱熹也说他“要改者便改……伤之太锐”。这一强大的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既决心改革，他为什么又匆匆决定在淳熙十六年二月禅位于光宗？这些都是十分吃紧的关键问题，如果不能找到近情近理的历史解释，则上面所说的那个“遗失的环节”还是无法恢复的。为了彻底追寻这些问题的解答线索，我们最后不能不闯进皇权的领域。

从淳熙十五年到庆元初年，理学集团、官僚集团和皇权是权力世界三股原动力，三者各有相对的自主性但同时也是互动的，不能截然分开。我们既然分别重建了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活动，最后自然也必须以皇权为主体，考察它在同一时期的动态，否则我们便不可能对朱熹的历史世界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这一时期皇权的最大特色是它分裂为两个中心：孝宗（退位后的“太上皇”）所代表的改革中心和光宗所代表的反改革中心。不用说，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便分别聚拢在孝宗与光宗的周边，推波助澜。但是我们绝不能把这两个敌对的集团简单地看做是分裂皇权的依附者。无论是理学集团之于孝宗，或官僚集团之于光宗，都不是一种“奉命行事”的被动关系。上面我曾说，孝宗与理学集团结成了政治联盟，光宗与官僚集团也正可作如是观。结盟的双方当然有共同的目的，但也各有不同的打算或不同的动机，此处不必详及。但皇权何以分裂，以致直接激成外廷的政争，则是下篇专论所必须正面处理的大问题。为了深入清理皇权内部的状态，本书最后一章将集中研究孝宗和光宗两个皇帝的生活与思想背景。在历史著作中，除了极少数雄才大略、功业彪炳的帝王之外，一般所谓“中材之主”是不受注意的；他们好像是京剧中演“王

帽”的角色一样，往往只作为一种配景存在于舞台之上，唱功与做功都是无份的。这种情况中外皆然，但在中国现代的史学研究中偏向更为明显。即以宋代而论，史学家写熙宁变法，对王安石必作详细的研究，但于神宗则一笔带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决意起用王安石，全面展开变法运动的正是神宗。但他为什么以一个未及弱冠的青年，初即位便有此创辟之举？前乎此，只有汉武帝的“改制更化”才可以与之相比。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了确定孝、光二帝在“遗失的环节”中的作用，第十二章遍搜一切有关史料，试图以心理事实为基础，探求孝宗“末年之政”的动力所在，以及皇权为什么终于分裂为二。所以此章讨论的重心特别放在孝宗上与高宗、下与光宗之间的心理冲突上面。这便不得不折入心理史学的领域。心理史学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不同文化的内在制约，稍一不慎，便会流于荒诞不经，所以是一险途。但我的探索基本上是从中国已有的心理观察出发。《孟子·离娄上》说过：

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这已明白点出了父子之间心理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朱熹则指出：

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夫岂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时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文集》卷三〇《与张钦夫三》）

这更证明宋代理学家早已发现了人心中非理性的向度。所谓“泯然无

觉之中，邪暗郁塞”即相当于潜意识中种种动力，殆可断言。所以心理史学可以施之于孝宗、光宗的研究，在原则上是不成问题的。以实际操作程序而言，最后一章并不奉任何一家的理论——包括弗洛伊德在内——为金科玉律；相反地，此章以建立孝、光二帝的具体心理事实为起点，然后引心理史学研究中与之相应的成果作为一种参照系统。一言以蔽之，基本的指导原则是“量身裁衣”，而不是“削足适履”。

第十二章的篇幅最长，这是因为它同时兼有统合的功用；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在孝、光、宁三朝的长期争衡，只有通过皇权内在变化这一主轴，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历史说明。八百年来，所谓“庆元党禁”一直是南宋政治史、文化史上一个不可解之谜，虽现代专家也感到“无可多说”。（参看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两宋史研究汇编》，页274—277）本书的专论并非针对“庆元党禁”而发，但在整个“遗失的环节”基本上得到了恢复之后，这个“党禁”之谜便不解而自解了。

关于最后一章，我还要做两点澄清：一、此章虽涉及心理史学，但绝不预认心理因素普遍存在于一切史事之中，更不带有任何心理决定论的涵义。这仅仅表示，在皇权分裂这一重大事件上，孝、光二帝特殊的心理状态恰好发生了关键性的效用；离开这一心理向度，下篇“遗失的环节”的重建便没有完成的可能。二、强调皇权的重要性并不是夸大皇帝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毋宁凸显了当时的权力结构。“失心疯”的光宗也可以在关键时刻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由于皇帝掌握了权力之源。这里并不承认皇帝个人有什么“天纵圣明”的“超人魅力”（“charisma”），韦伯指出中国皇帝的“超人魅力”系于皇位（“the charismatic character of the royal office”），不失为一个深刻的观察，虽然他的分析仍嫌空泛。（参看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vol.2, p.1113) 秦、汉以下的皇帝, 无论是“创业垂统”之君或“守成之主”, 都可以作如是观。

澄清这两点之后, 读者对于下篇的主旨也许便不致发生文外的误解了。